

“四人帮”及其余党在上海人民出版社 推行反革命政治纲领的罪行

（附：帮刊《朝霞》材料摘编）

内部材料 不得外传

上海人民出版社运动办公室编印

1978年1月

附：“四人帮”帮刊《朝霞》炮制阴谋文艺作品出笼情况

(材料摘编)

目 录

- 〈一〉“四人帮”及其余党通过《朝霞》，公然把矛头指向毛主席和华主席……………(1)
- 〈二〉恶毒地影射攻击敬爱的周总理……………(3)
- 〈三〉抛出大量写“与走资派斗争”的毒草作品，妄图打倒从中央
到地方的一大批党政军负责同志……………(7)
- 〈四〉反军乱军，叫嚣“揪军内走资派”，鼓吹搞“第二武装”，妄图毁我长城……(9)
- 〈五〉打出反映文化大革命的“征文”旗号，歪曲和污蔑文化大革命……………(11)
- 〈六〉借所谓“资产阶级法权问题”，攻击无产阶级专政……………(13)
- 〈七〉“四人帮”及其余党利用文艺形式，无耻地吹捧他们自己，
为他们的“登基上台”，大造反革命舆论……………(16)

**附：“四人帮”帮刊《朝霞》炮制阴谋
文艺作品出笼情况
(材料摘编)**

“四人帮”的帮刊《朝霞》是“四人帮”大搞阴谋文艺的重要基地。从1973年5月第一辑《朝霞》丛刊出笼,到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为止,三年多来,张春桥、姚文元对《朝霞》下了很多黑指示,“四人帮”余党朱永嘉、肖木、陈冀德更是直接操纵,严加控制。《朝霞》发表任何一篇作品,都要通过陈冀德;大部分重点稿,都是由陈冀德从选题一直抓到定稿;每一期刊物的清样,都要由飞机直送北京经肖木“审阅”后付型。“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每一个反革命部署,《朝霞》都是紧密配合,射出了一支支毒箭,矛头直指伟大领袖毛主席,直指英明领袖华主席,直指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和党政军其他领导人。这里摘编的仅是“四人帮”帮刊《朝霞》炮制的部分毒草作品出笼的情况材料,供同志们批判时参考。

**(一) “四人帮”及其余党通过《朝霞》,公然把矛头
指向毛主席和华主席**

1、丧心病狂地影射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

在毛主席病重期间,陈冀德指定《朝霞》在1976年7月号发表由反动文痞王知常授意炮制并亲自修改定稿的随笔《太阳颂》,借议论太阳内部的矛盾运动,丧心病狂地影射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

2、猖狂对抗毛主席指示

1975年7月,毛主席多次发出关于缺少文艺作品,应该调整党的文艺政策的指示。“四人帮”不思悔改,蓄意对抗。同年9月26日,肖木居心险恶地窜到《朝霞》,打着“少要转化为多”的幌子,针对毛主席批评的四个“缺少”,布置《朝霞》搞诗歌、小说、散文、文艺评论这四个“专辑”,妄图向伟大领袖毛主席示威。

甲、欧阳文彬同志1977年11月18日的揭发

一九七五年七月，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了关于文艺问题和影片《创业》的指示，邓副主席在毛主席领导下对“四人帮”进行了多次批评和帮助。“四人帮”一伙竭力封锁，疯狂对抗。九月二十六日，原市委写作组掌管文艺的头目陈冀德把“四人帮”的黑干将肖木拉来《朝霞》编辑室放毒。肖木先讲了一通他在浙江待了两个月，听到一些谣言，接着就煽动编辑、作者要“坚持”，“不要动摇”，“对小道要分析”。在讲到毛主席关于文艺问题的指示时，肖木说他没听到传达，然后以谈个人体会的方式歪曲毛主席的指示，说什么“文艺方针要作些调整，并不意味着过去错了”，“主席指示是积极的”，“调整就是大方向不变”，“各种议论出来，我们寸步不让”；“小说、诗歌、散文、评论，主席指出四个缺少，要转化为多，要经过全国、全党、包括《朝霞》的努力。”肖木又说：“我们曾经想搞四个专辑”，“评论专辑有困难，可以放后一些”。肖木还强调“调整政策”、“调动积极性”“肯定会有毒草”，“有了毒草照样批判”。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

乙、反动杂文《批评家和“不平家”》

1976年初，“四人帮”及其余党以为反扑的时机成熟，布置石一歌抛出反动文章《批评家和“不平家”》，指定在2月号的《朝霞》上发表，再次攻击毛主席关于调整党的文艺政策的指示。下面是这篇文章有关段落的摘录：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风暴的洗礼，社会主义文学艺术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凡是革命的文艺批评家无不为此欢欣鼓舞，他们热烈赞颂满园春色的“佳花”，同时也以满腔热情辛勤地灌溉和扶植着“佳花的苗”，积极地为新生事物的成长创造一切条件。而那些“不平家”则不同了，他们对于新生事物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总觉得这也不是，那也不是，这也看不惯，那也看不惯。这些人就象鲁迅小说《风波》中的九斤老太一样，总是摇着头感叹“今不如昔”。

新生事物的成长总有个艰难曲折的过程，它有“幼稚”的一面，问题是如何看待“幼稚”，是充分地肯定它的成绩，热情地采取措施，促使他更加完美呢？还是横加指责，大泼冷水，甚至心怀敌意，任意加上一系列莫须有的罪名，将其扼杀于方兴未艾之中？

3、恶毒攻击华国锋同志

在毛主席逝世前后，“四人帮”及其余党借地震问题，恶毒地攻击华国锋同志。

甲、朱敏慎同志1977年11月17日的揭发

一九七六年八月十一日，“四人帮”授意《人民日报》发表关于抗震救灾的社论，攻击华主席。就在这时，陈冀德就布置编辑室组织抗震救灾的诗歌、散文，她说：散文

可写上海如何支持唐山。我们就组织林正义去写一篇，陈冀德曾把林正义找到写作组去谈。作者根据陈冀德的要求，写成《在严重的考验面前》一文，通篇不提当时受伟大领袖毛主席委托赴唐山灾区慰问的华国锋同志，并且在文中宣扬“四人帮”授意《人民日报》发表的关于抗震救灾的社论中的反动观点，写一个走资派形象来宣扬“最危险的不是天灾，不是地震，而是党内的资产阶级”的反动观点，紧密配合“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

乙、《在严重的考验面前》部分段落的摘录

对于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来说，最危险的不是天灾，不是地震，而是党内的资产阶级。如果我们放松了对于他们的斗争，地震没有把我们的事业震垮，他们却有可能把我们的事业搞垮；灾害没有把我们的人心搅乱，他们却有可能把我们的人心搞乱。

几千年来，记载着多少次自然灾害造成的震惊人寰的“浩劫”。可是，当世界将要跨入二十一世纪的时候，在中国的大地上发生的这一场严重的自然灾害，却要在人类史上留下崭新的一页！

（二）恶毒地影射攻击敬爱的周总理

1、朱永嘉、陈冀德一伙利用所谓“农场问题”和“知识青年的问题”，疯狂地反对周总理

甲、朱永嘉1977年8月16日“关于农场问题上对抗总理指示的罪行交代”

（节录）

关于农场管理工作问题，总理曾经指示可以进行工分制的试点，要注意加强对农场的经营管理。张春桥在上海对抗总理的指示，一再说农场问题主要是路线问题，班子问题，他不信“马克思主义在国营农场这个问题上就不灵，全民所有制在国营农场的问题上就没有优越性”，为此张春桥多次布置我们进行农场问题的调查。七四年的夏天，我还带了顾澄海、陈冀德，×××等到前进农场进行调查，最后还炮制了《前进农场宣言》，发表在《学习与批判》上，还把张春桥的这些反革命黑话引在这篇宣言里。

乙、陈冀德1977年9月20日的交代（节录）

农场问题，知青工作问题，实际上都是朱永嘉攻击总理的炮弹。每当阶级斗争尖锐的时候，“四人帮”要打倒总理取而代之的时候，朱永嘉就要去抓农场问题了，七二年以来可以说已经成了规律。而每一次，我几乎都是紧紧跟在后面，紧密配合，用我的所谓正面配合的方式，把矛头指向了总理和以总理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成为“四人帮”阴谋篡权的得力助手和工具。

丙、陈冀德1977年9月20日关于《青春颂》出笼经过的交代（节录）

研究了七四年第一期丛刊的选题抓些什么时，我提出搞反映农场在前进这样的主题的专辑。这个专辑就是七四年上半年出版的丛刊《青春颂》。这本集子里的具体选题，都是作者自己根据我在编辑部提出的要求提出来的。其中姚真与林正义合作的《青春颂》在构思时，我与作者讨论过几次，讨论的时候张春桥、朱永嘉关于农场问题的那套反动谬论都通过我的嘴巴灌输给了作者，东北农场搞工分制，资本主义复辟这些话都讲了……而且提出要从两条路线的高度上来提高作品的思想。又一次把矛头指向了总理。

丁、在1975年7月号的《朝霞》上，抛出了小说《带班的人》，其中塑造了一个搞“复辟”的老班长李海根，直接点出了他对“工资制”的看法，并对此进行影射攻击。

2、朱永嘉、陈冀德一伙，利用所谓“造船问题”、“风庆轮事件”、“蜗牛事件”，大反周总理

甲、朱永嘉1977年1月4日的交代（节录）

我们在《朝霞》上发表了不少批判崇洋媚外的小说，如《一篇揭矛盾的报告》，还专门把“蜗牛事件”作为细节穿进小说里去，还有七四年初的《试航》这篇小说也是批崇洋媚外思想的，以后还拍成美术片，受到姚文元这个反革命黑帮的称赞。最恶劣的是故事新编《李鸿章出洋》，这些作品都是射向总理的毒箭。

乙、陈冀德1977年7月7日关于《远航书简》的交代（节录）

风庆轮远航回上海后，我和朱永嘉一起到风庆轮去参观并开座谈会，在休息时，朱永嘉问我感觉怎么样？很有收获吧。他说，你看有些人就是比刘少奇走得更远。当时我对朱永嘉说的这些话在思想上是完全共鸣的。我想刘少奇时船还没有造出来，现在船造出来了，而且是好船，还要买船，确是比刘少奇走得更远了。当时配合风庆轮宣传写小说反映是我主动向朱永嘉提出来的。这是在路线上的心领神会。以后，我在与《远航书简》的作者谈构思的时候，我讲的对立面，依旧是交通部、六机部的某些同志，只讲刘少奇的流毒没有肃清，并不敢讲比刘少奇走得更远这样的话，我想这样弄不好要攻到总理头上去了。

丙、陈冀德1977年9月16日关于《一篇揭矛盾的报告》的交代

批林批孔一开始，江青就制造了一起所谓“蜗牛事件”，把矛头指向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在这一反革命阴谋遇到可耻失败以后，“四人帮”及其余党在上海组织反扑。1974年4月号的《朝霞》上，公然抛出毒草小说《一篇揭矛盾的报告》，直接描写

了所谓的“蜗牛事件”，疯狂攻击和影射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下面是陈冀德关于这篇小说的交代（节录）：

写作组经济组的同志在学习会上传播了江青攻击总理的所谓“蜗牛事件”，朱永嘉听到以后说，这是可以写小说的材料。在谈创作构思的会上，我在提出要求谈构思要提高对主题思想的开掘时，举了“蜗牛事件”的例子，还提出象电珠五厂这样的素材，它的主题完全可以提到批判洋奴哲学、爬行主义这样的高度上来，与当前的斗争（批林批孔）配合起来。散会以后，电珠五厂这个选题又作了具体研究，我对施燕平提出，这个组的创作力量要加强，建议把×××同志加进去，重新到电珠五厂和上级公司党委作调查，作品的主题要与批林批孔的形势（实际上是与“四人帮”另搞一套的反革命形势）结合起来。根据这些意见，施燕平去具体落实。我把对电珠五厂这个题材采取的这些措施都向朱永嘉作了汇报，朱永嘉说，好的，这篇作品一定要抓出来。

丁、大毒草《一篇揭矛盾的报告》发表后，“四人帮”余党朱永嘉、王知常、肖木一个个欣喜若狂，大叫：“蜗牛用得妙！”“蜗牛加得不笨！”并组织作者再写“续篇”《典型发言》，同时连篇累牍组织吹捧文章，扩大它的反革命影响。1975年初，正当“四届人大”召开的前后，肖木为了配合“四人帮”阴谋组阁和疯狂反对周总理，赤膊上阵，化名“方铿”，亲自炮制反动文章《新人任树英》在《人民日报》发表，吹捧这两篇大毒草。

3、“四人帮”及其余党疯狂反对“四个现代化”，把矛头指向周总理

甲、肖木在1975年4月14日窜到《朝霞》，他用极其险恶的语言，大肆攻击敬爱的周总理。以下是欧阳文彬同志1977年11月18日的揭发

一九七五年初，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根据中央决定，代表国务院向四届人大作了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的宏伟规划。全国人民为之欢欣鼓舞，“四人帮”却对此极端仇视。现已查明，这年春节，“四人帮”的干将肖木给国民党特务张春桥写了一封信，祝贺“新年愉快”。张春桥在信上作了黑批示：“希望2000年过得更好。2000年虽然遥远，也算是一种安慰。”矛头直指周总理。肖木窜来上海，把张春桥的批示给陈冀德看后，共同策划于4月14日在《朝霞》召开诗歌作者座谈会，予以贯彻。

肖木在会上大放厥词，贩卖张春桥的黑货，说什么：“有人以为共产主义越来越遥远了，这样宣传人们会提不起劲头，可以鼓舞人，将来会好的，安抚一下。希望这种先生不要以大人之心度群众之量，群众不会因为共产主义一时不能实现就不积极了。大人先生想用支票来鼓舞群众的积极性，是成问题的，这样鼓舞起来的积极性不是共产主义的

积极性，是个人主义的积极性。”肖木在这里把关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规划污蔑为“支票”，恶毒影射攻击周总理，真是反动透顶！

乙、1974年11月，《朝霞》抛出了一组散文《上海啊，你的未来》，直接为“四人帮”阴谋组阁制造舆论，矛头直指周总理。下面是陈冀德1977年9月20日的交代（节录）

七四年十月，朱永嘉从法家著作注释出版工作座谈会回来，又要到崇明农场去了。这次一起去的有我和姚真。他对我说，春桥同志对他说，崇明是祖国第三大岛，一个小小的香港，搞得如此繁荣发展，崇明又有上海这样的条件，完全可以发展起来。他要为此去鼓吹鼓吹。朱永嘉这个时候吹捧上海，吹捧张春桥，与同时肖木在搞的造船调查提供整总理的炮弹，是一个阴谋的两个方面。又是酝酿召开四届人大的时候了，“四人帮”阴谋组阁，朱永嘉借此为张春桥上台制造反革命舆论。从农场回来，朱永嘉拚命抓所谓“上海在前进”的规划，要我们组织业余作者写有关规划的选题。开始感到很困难，规划还是纸头上的东西，这不是硬做文章吗？最后还是抓出来了，写出了《上海啊，你的未来》，有五个短散文集在一起的一篇大散文。

丙、欧阳文彬同志1977年11月20日的揭发（节录）

一九七四年十一期《朝霞》发表的大型散文《上海啊，你的未来》，是“四人帮”余党朱永嘉亲自出题，授意《朝霞》组织作者采写的。

这年八月，中央召开十八省、市书记会，国家计委负责人在会上讲话，布置搞十年规划。朱永嘉当时去过北京，回来后要余秋雨（陈冀德病假，由余代管《朝霞》）通知《朝霞》借调作者搭起大散文创作组。

八月二十四日，余秋雨到《朝霞》，吹嘘“中央（实为张春桥）接见了朱永嘉”，“春桥同志认为（在订规划的问题上）上海应当走在前面”。余说：“上海已成立远景规划小组，不久将形成高潮。希望《朝霞》用文学形式先立一记战功，它的意义相当大。”

这篇文章写得很艰苦，因为到基层采访时发现订规划并没有推开，大多数单位都没有动。……几位作者感到很难领会他们的意图，从九月下旬到十一月上旬，反复修改，有的章节一再推翻重来，甚至改写了十几稿，弄得信心都没有了。最后经余秋雨改定发排，校样出来后又被陈冀德推翻，临时再改，拆版重排。

最近查对了校样和改样，发现文中许多关于实现现代化的描写几乎全被删去。……

这刊物付型时，陈冀德还打电话到印刷厂，要把大散文的题头图换掉。因为这个题图画了飞机、巨轮、电视塔等装饰图案，陈冀德竟说：“这就是现代化吗？要说现代化，美国最现代化了，苏修不也是现代化的嘛！”

4、朱永嘉、陈冀德一伙在“基础理论”等问题上影射攻击周总理

“四人帮”反周总理的手法是极端卑劣的，他们利用批“黑画”反总理，利用批“无标题音乐”反总理，利用评《红楼梦》反总理，这些罪恶活动在《朝霞》都有表现。特别是在周总理多次指示加强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以后，“四人帮”及其余党对此进行了猖狂的攻击，朱永嘉、陈冀德迫不及待地抓出了剧本《抗寒的种子》，指定在1974年4月份的《朝霞》上发表，剧本中恶毒地攻击周总理的指示是“一股西伯利亚寒流”。下面是陈冀德1977年8月8日的交代（节录）：

《抗寒的种子》发表于《朝霞》74年第4期，这篇作品是朱永嘉亲自抓出来的，……这个剧本的要害是全盘否定基础理论的，并且把矛头不恰当的针对着老知识分子，实际上是影射周培源的。朱永嘉曾在讨论基础理论问题时，对我说过，周培源这笔账总是要算的。

（三）抛出大量写“与走资派斗争”的毒草作品，妄图打倒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党政军负责同志

1、炮制《警惕，走资派还在走！》一文

邢庆祥同志的揭发

一九七六年二月上旬，编辑室送“三月号选题”时，评论是放在目录的最后，其中没有“评《春苗》”的选题。二月中旬，“四人帮”余党陈冀德布置编辑室组织一篇评论电影《春苗》的文章，还说“电影厂收到许多群众来信，其中有攻击《春苗》的，可以叫作者去看看”。后来我们就组织电影局的同志写，也叫作者去电影厂看看信。二月下旬，作者交来了稿子，题目是“警惕，杜文杰犹在！——从对《春苗》的评价谈起”。三月上旬，校样排出后，陈冀德打电话来编辑室要叫作者加强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内容。由林正义和我找作者谈话。于是加了什么“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对《春苗》却十分反感，他看了一半，就拂袖而去，连声斥之为‘极左’”，“那个提出‘三项指示为纲’的杏黄旗，……”“实际生活中已经有一个活标本：去年夏季前后，背着毛主席、党中央提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带头刮起右倾翻案风的，不正正是那个受过革命群众批判，再三保证‘永不翻案’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吗！……”等。后来，陈冀德又打电话给编辑室要给作者说加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内容，作者提出没有参加理论工作座谈会，不清楚毛主席指示的内容，陈冀德要我们给作者说，看看这几天的报纸，毛主席的指示已经有了，不过没有用黑体。后来就加了“严酷的阶级斗争事实告诉我们：在社会主义时期，不仅要看到社会上还存在着地主、资产阶级，更重要

的是要看到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陈冀德还叫把题目改成“警惕，走资派还在走！——从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攻击《春苗》谈起”。三月十二日，我们去印刷厂付型。陈冀德又打电话来，要把文章中“那些走资派”都改成单数。由编辑室在文章中改了几处：“风源就来自那个不肯改悔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派”，“迎头痛击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刮起的右倾翻案风”！

2、关于《历史的审判》

1976年初，张春桥亲自给上海余党下达黑指示，指定题材和作者，布置写“与走资派斗争”的作品，并要求写得更“深刻些”。根据这一黑批示，陈冀德一伙抓出了大毒草《历史的审判》，只是由于“四人帮”的垮台，才没来得及在《朝霞》上出笼。

甲、张春桥写给陈冀德的反革命黑批示（节录）

刚刚看完姚真写的《峥嵘岁月》，想到一些事。前一时期，社会上到处在喊打倒资产阶级派性，而我们有些同志，忘记了文化大革命初期，正是那些走资派挑动群众斗群众，坐山观虎斗的历史，也跟在后面喊。请你和姚真商量一下，能否在反映阶级关系变化方面，写出比《战旗》（指姚真的另一篇小说《红卫兵战旗》）深刻些的作品来。

乙、陈冀德1977年3月24日关于《历史的审判》的交代（节录）

1976年初，张春桥在退朱永嘉信中，有一段写给我的批示，批示的结尾还说这个意见供我和姚真参考，不要去对别人说。我看到以后，就把姚真找来，把原批示也给她看了，商量怎么具体落实……在小范围里，我曾讲过姚真写的这篇小说一定要抓出来的，这是领导上布置的任务，张春桥有过批示。

丙、姚真同志“关于大毒草《历史的审判》出笼的情况”（节录）

去年（76）一月底，一次我到写作班去，陈冀德把我叫到她小房间里，给我看一封信。这是大叛徒张春桥写给陈的一封信，大体内容如下：（略）

我看完信问陈冀德：根据信的要求，是写当前呢？还是写文化大革命初期呢？陈想了想说：恐怕要写现在。我说：这就难办了，我没有这方面的生活，上海情况也比较稳，没有想过派性。陈说：真要写，可争取到外地跑一跑，给朱永嘉讲一讲，要到浙江，还可以找罗毅。

采访工作是六月中旬开始的。

在采访过程中，我曾在写作班遇见张家龙，张问我：领导同志交的那篇任务完成得怎么样？可见，张也知道此事。

六月底、七月初，在讨论《朝霞》八月号的选题会上，陈冀德对编委们说起这件事。她说：领导同志看了姚真的《峥嵘岁月》和×××的《为革命委员会站岗的人》，还要

我们继续写走资派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小说。并说题目我也想好了，叫《冲锋在前》……

关于题目问题。《冲锋在前》是陈冀德起的，我觉得较一般，人家书名也用过，想改为《审判台》，最后拟定为《历史的审判》，意思是走资派挑动群众斗群众，把一些群众和犯有一般错误的人推上“斗鬼台”，结果自己受到历史无情的审判。陈冀德感到这也可以，同意了。

丁、大毒草《历史的审判》中一段直接体现“四人帮”反革命政治纲领的描写

“历史就是这样无情，也许在大革命的洪流中，你曾经被卷进去，跟随无产阶级，把地主资本家押上历史的审判台，然而，历史在前进，倘若你逆革命潮流而动，无疑，你将与一切反动派一样，遭到历史无情的审判。”红卫兵郭照亮站在司令台上这样总结着两个月来，在阶级斗争的百科全书中学到的知识。

3、关于《总攻发起之前》

在1976年短短的几个月里，“四人帮”及其余党通过帮刊《朝霞》，连续抛出了几十篇写“与走资派斗争”的毒草作品，为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服务。这是陈冀德1977年8月8日关于炮制《总攻发起之前》的交代（节录）：

76年3月号《朝霞》上的带头稿《总攻发起之前》，开始作者的素材是来自文化大革命期间银行的同志抵制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的事迹。作品写出来以后，“四人帮”括起一股要写大走资派的妖风。我当时把作者找来，逐段讨论，一定要提高作品中主要英雄人物和主要对立面人物的政治身份，要写到市一级的斗争，写大走资派。

（四）反军乱军，叫嚣“揪军内走资派”，鼓吹搞“第二武装”，妄图毁我长城

1、大毒草《千秋业》

《千秋业》是“四人帮”安插在总政的亲信陈亚丁亲自指使炮制的，“四人帮”余党徐景贤、肖木、朱永嘉、陈冀德等人与陈亚丁互相勾结，南北呼应，在1976年的《朝霞》丛刊上抛出了电影剧本《千秋业》，在北京则几乎同时公演了由此改编的毒草话剧《千秋大业》，向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扔出了他们的所谓“重磅炸弹”。下面是陈冀德1977年8月8日的交代：

《千秋业》，发表于《朝霞》76年5月。这个电影文学剧本是76年2月初，胡锡涛推荐给我建议在《朝霞》丛刊发表的。胡在寄剧本来时，附有一信，信中讲到作者是八一电影制片厂的编剧，长期在部队中深入生活，这个稿子已经是作者的修改稿了，几稿他都看过并提过意见，感到这个修改稿比过去有很大进展。胡锡涛还说，八一厂文学部现

在较乱,没有可能过问这个本子。作者给他看,他就寄给我们看看。我收到这个剧本后,随即给了一本给张家龙。当天我自己就把这个本子看了,感到基础确实不错。第二天在食堂吃饭遇到张家龙,他说他也看了本子,感到不错,可以从路线斗争的高度往深处挖,他准备把本子推荐给电影厂的同志。我自己看了本子就感到不错,经张家龙这么一说,就更有把握了。我对本子提了一些艺术性方面的意见,请《朝霞》编辑部的同志看,如果他们认为可以,我和他们一起抓。与此同时,我把胡锡涛推荐这个本子,以及这个本子是写部队培养提拔新干部的内容都告诉了朱永嘉,他也同意抓这个本子。编辑部的同志看了本子后,认为可以抓这个本子,并建议把作者借到上海来修改。在作者在上海修改过程中,我和编辑部的同志一起与作者谈过一次意见,主要谈了以下几个方面:(略)

我谈这些意见时是在76年4月初,当时正是“四人帮”大刮写走资派的妖风,提出“老干部”等于“民主派”,等于“走资派”这一反革命纲领的时候,我的这些意见是紧跟“四人帮”这一反动思潮的。

2、为反军乱军大吹大擂的《闪光的军号》

早在1974年初,江青组织“炮队”“放火烧荒”的时候,肖木就与陈冀德合谋,指使林正义在《朝霞》上抛出了最早写所谓“军内走资派”的毒草小说《闪光的军号》,为“四人帮”反军乱军大造反革命舆论。这是陈冀德1977年8月8日的有关交代(节录):

《闪光的军号》,发表于七四年《朝霞》第二期。这篇作品的题目是肖木出的……。我在与《闪光的军号》的作者谈意图的时候,把这些想法都说了,我还说,现在反映部队思想、路线斗争的作品很少,看到的都是写军训的,我们写了,搞不好要得罪部队的同志,我叫作者不要怕,如果因此而挨整,由我负责,大不了撤职就是了。作品写出后,肖木在校样上提了比较具体的意见……作品发表后,肖木提出要组织评论文章,并说作品的意义要到以后才看得出来。

3、毁我长城的《前线》

在1976年8月号的《朝霞》上,抛出了一篇名为“纪念八一”实为反军乱军、毁我长城的“带头”小说《前线》,大肆诬蔑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写所谓“军内走资派”。下面是陈冀德1977年8月8日的交代(节录):

作品是写文化大革命初期部队支左的内容,一个贯穿性的情节是部队成了地方上走资派的防空洞,最后把他送到群众中去了事。我看了以后觉得基础不错,当时肖木在上海,我把作者的原稿送给他,叫他也看看。肖木看了以后说,这篇作品基本上已经成了,还说作者的思想很敏锐。我随即又把稿子送到编辑部,并提出反映部队而又写思想路线斗争的作品,《朝霞》上很少发表,我认为这个稿子所写的内容,还是有现实意义的,要编辑部把修改意见找作者谈一次,准备在八月号纪念建军节发表。……《前线》这枝毒草的出笼,是在毛主席病重,“四人帮”加快篡党夺权的步伐的时候,作品宣扬的军

队要支“左”的思想，实际上是想做军队的工作，为军队支持“四人帮”造舆论。它在当时的政治斗争中起了为“四人帮”篡夺领导权制造反革命舆论的作用。

4、鼓吹“第二武装”的《初试锋芒》

“四人帮”在疯狂反军乱军的同时，大抓“第二武装”。在《朝霞》创刊时，“四人帮”余党就拼命搞有关“第二武装”的小说。下面是陈冀德1977年8月8日的交代（节录）

《初试锋芒》，发表于《朝霞》74年第1期。这篇作品的选题，来自“四人帮”搞的所谓民兵调查。当时《朝霞》创刊号缺乏有份量的带头稿，我主动向朱永嘉提出，以民兵调查的指导思想为作品的思想，组织搞一篇歌颂民兵的小说，作为带头稿，朱表示赞成，他还说，巴黎公社之所以后来能够和强大的资产阶级干，靠的就是武装工人。

（五）打出反映文化大革命的“征文”旗号，歪曲和污蔑文化大革命

1、反党的“集束手榴弹”——《序曲》

早在1973年《朝霞》月刊出笼之前，肖木、陈冀德就在丛刊上抛出了三篇打着“反映文化大革命”旗号的大毒草，歪曲历史，颠倒黑白，为“四人帮”在党的“十大”期间阴谋篡权鸣锣开道。1974年月刊创刊后，他们又公开打出“征文”的旗号，大量炮制借反映文化大革命为名、宣扬“改朝换代”的毒草作品。到1975年，由“四人帮”余党指令将这些毒草汇编成集子，题名《序曲》，作为向党进攻的“集束手榴弹”抛了出来。1976年，这本黑书得到了反党野心家江青的赏识，下令改编成“电影和戏”，造成了极其恶劣的政治影响。

甲、大野心家江青的反革命黑批示

可以从《序曲》中选材改编成电影和戏。

乙、陈冀德1977年8月5日的交代（节录）

76年4月，江青看上了由“征文”选集合起来的集子《序曲》，由文化部布置全国各制片厂分工把《序曲》中的作品改编成电影。江青看中《序曲》的时候，正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高潮时期，她借《序曲》的改编，为打倒邓小平同志，进一步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制造舆论的用心，是十分明显的。这实际上也就是从反面对《序曲》这本所谓反映文化大革命斗争生活征文选作出了评价，它对“四人帮”实现篡党夺权有好处，是为这一阴谋的实现制造舆论的。

《序曲》前面的三篇带头稿，是肖木和我73年写的。肖木的两篇《初春的早晨》、

《金钟长鸣》在构思的时候曾和我一起讨论过，我写的《第一课》肖曾作过修改。这三篇较早反映文化大革命生活的作品，也是在否定文化大革命前的一切这样的反动思潮的影响和指导下写出来的。

2、对党对人民“加强进攻姿态”的“征文”

1975年底1976年初，正当“四人帮”加紧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阴谋活动的时候，肖木居心险恶地提出：《朝霞》要加强“进攻的姿态”。陈冀德指令《朝霞》，从1976年起，重新打出“征文”的旗号，继续以反映文化大革命为名，大肆制造反革命舆论。

甲、陈冀德1977年1月12日的交代（节录）

（1975年底）在《朝霞》12月号校样全部送给肖木以后，他马上打了个电话给我，要我马上到编辑部去作紧急动员，说这刊物跟不上形势，提出要有进攻的姿态。当时校样已齐，过一两天就要签字付型，而且教育革命方面的内容已有所配合，我就问他怎么攻，朝哪里攻，他又不说。我说这样叫我怎么去动员法？我没有动员也没有告诉编辑部的同志，但对朱永嘉说了，我说，这样搞法，还要说跟得不紧，干脆不要办文艺刊物了。朱永嘉说真是难得，肖木的话你也不听了。我看朱永嘉并没有一定要叫我到编辑部去动员的意思，心想肖木批评起来我就拿朱永嘉去顶。第二天肖木紧接着又打了个电话给我说，你不要紧张，既然你思想不通，这一期就这样算了。但他在退校样的时候，把一篇一般性的评论《第二个春天》的评论文章提为带头稿，亲自改了一个非常响亮然而实在是题不对文的题目，叫《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春天》。我看到他改的这个题目，联想到张家龙通的一些小道和徐景贤的话，以及徐景贤曾跑到写作组来批评朱永嘉、王知常为什么不在《学习与批判》上转载两校的文章等一系列事情，敏感到当时看起来展开的是教育革命上的一场大辩论，而实际上是个肯定和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肖木在对12月号刊物提意见后，又打过一个电话给我，说是否可以在《朝霞》上辟一个栏目搞些文艺性的杂文，这样可以避免出现12月号那样跟不上形势被动的局面。他要求作者队伍不要扩大，便于通精神的时候不致于面很大，这实际上是要在《朝霞》上搞一个体现“四人帮”的思想路线政治要求的御用栏目，我当时是全领会了他的意思的，认为这是《朝霞》的眼睛，出精神的地方。

乙、陈冀德在接到肖木的反革命命令箭以后，马上亲自动手抓“征文”，在1976年1月号上抛出了毒草小说《峥嵘岁月》和《为革命委员会站岗的人》，重新亮出了“征文”的旗号。下面是姚真1977年11月18日关于《峥嵘岁月》出笼经过的揭发（节录）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天左右，林正义约我写一篇反映文化大革命红卫兵的小说，林说，小说专号正缺少这方面的作品，你赶一赶。林请示陈冀德后得到同意。我在13日左

右找了林正义谈了提纲，并写了初稿。

这篇小说从炮制到发表前后不过二十来天，赶得非常匆忙，而陈冀德抓住不放，一再说要努力，并提了许多具体意见，正是有其险恶用心的。从当时政治背景看，七五年底、七六年初，“四人帮”背着毛主席打击诬陷邓小平同志，把矛头指向中央和地方一大批领导干部，是从教育界开刀的。我按照陈冀德的意图，在小说中加强了走资派舒展，并从走资派演变中引出了所谓文化大革命峥嵘岁月给予我们最深刻的经验教训（见第一期第二十二页），在内容上涉及到教育领域中的“培养目标”“大学招考”“教学方法”等许多问题，又在复课复旧的情节上大做文章，实际上是把十七年教育战线写得一团漆黑，把矛头指向广大革命老干部，配合了“四人帮”背着毛主席打击诬陷邓小平同志的罪恶阴谋。

（六）借所谓“资产阶级法权问题”，攻击无产阶级专政

1、一组黑诗：《把炉火烧得通红》

1975年4、5月间，由肖木、陈冀德亲自出马，组织作者，抛出了包括《锁链·铁锤》在内的一组黑诗《把炉火烧得通红》。黑诗不仅与张春桥《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的黑文相呼应，把矛头指向一大批革命领导干部，而且当时正是毛主席批评他们搞“四人帮”之后，他们借这组黑诗发泄了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仇恨。

甲、陈冀德1977年8月8日的交代

《把炉火烧得通红》，发表于《朝霞》75年第5期。这组诗歌是在肖木的思想指导下写出来的。75年3月，肖木提出所谓诗歌要战斗的口号，实际上是要诗歌配合“四人帮”借口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打击一大批革命领导干部。75年5月，肖木到上海，到《朝霞》编辑部召开了诗歌作者座谈会，在会上，肖木鼓动大家要象鲍狄埃当年那样投入到现在批判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中去，他说现在我们这个国家还存在着剥削，他还说要警惕有人用物质利益，向人民许愿、欺骗人民等，把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说成是几乎不亚于文化大革命的一场政治大革命，甚至更艰巨。当时我的情绪也鼓动起来了，感到肖木讲得深刻。会后根据肖木会上讲的那些，立即组织了一个创作小组，《把炉火烧得通红》就是这个创作小组的同志具体执笔写的。在这组诗歌里面，张春桥《论专政》那篇黑文里的“打土围子”、蹲“安乐窝”、“到站下车”，“新资产阶级分子后面有长胡子的老资产阶级”等歪曲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恶毒攻击革命领导干部的内容，都写进去了。在文艺领域里与张春桥的黑文相呼应，并为之摇旗呐喊，所起的作用是极坏的。

乙、邢庆祥同志1977年11月的揭发

一九七五年四月，国民党特务分子张春桥抛出了黑文《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后，“四人帮”的亲信肖木窜到了上海，伙同“四人帮”的余党陈冀德，打着学习《鲍狄埃诗选》的幌子，到《朝霞》编辑部，于四月十四日召开诗歌作者座谈会。在会上，肖木说什么从前的诗歌没有配合政治任务，“远其道而行之”，“诗界无战事”，叫嚷诗歌“要刺刀擦亮”，“子弹上膛”，“把炉火烧得通红”，“要从诗歌燃到其他领域，要坚持战斗”。并亲自出题目，其中就布置了写政治抒情诗“镣铐”。肖木还说：“写这首诗要有大的努力，才能写好，要作些调查，了解一些对立面，了解萌芽状态的新生事物，要读一些巴黎公社革命传略。”诗写出以后，四月二十四日，肖木和陈冀德看了诗稿，又亲自找作者提意见，肖木说：“《锁链》题目无力，改《锁链·铁锤》，好，铁锤是正面形象，与锁链不是并列的，是砸烂的。”“五月号放在第一篇。”还说：“中间几段（指诗中第二节中的几段反面东西）是核心唱段，一定要改好，要改得凝炼些。诗的中心思想要突出。墙上挂着镣铐，有复活的危险，这是有形的，这样的说法没有体现毛泽东思想，事实上，锁链不仅在墙上，头顶上的锁链还在，要把有形的、无形的讲清楚。要把无形的锁链突出地写，如果对无形的锁链不注意，有形的锁链就会戴到头上来。诗的开头，就要写经济、道德精神上的锁链。攻难关，就要攻在这一点上。”“‘刺刀不能穿刺思想锁链’这个提法也不妥，容易给人产生误解，认为刺刀就是武器暴力，批资产阶级法权就不要军队和暴力了，还是要的。”后来经过一些修改，这篇毒草就在五月号上以带头稿出笼了。

丙、这是黑诗《锁链·铁锤》中的部分段落

“翻身的奴隶呵，可曾想过，你的颈上，还有没有锁链？”

不能说呵，松绑的血管，已经可以自由搏动，解放的肌肉，已经完全舒坦，不！在我们身上，还有——种种镣铐！条条锁链！

大好的社会主义江山，虽然蓬勃兴旺，百花争艳，但还存在着——镣铐复活的土壤，锁链再生的条件，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大地，虽有座座红色壁垒，道道钢铁壕堑，却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土围子”，小生产者的包围圈。

那个曾挨过老板耳光的徒工，在香风浓雾里头晕目眩，望着商品交换的万花筒，掉进货币黄金的乾坤圈；到处伸手，东捞西抓，收集铜钱，串起锁链，套上脖子，还满面笑颜……

那个曾经冲过枪林弹雨的战士，却在凯歌声中勒马下鞍：“功劳”当作支票，要向人民“兑现”；过去，不怕抛洒热血，今日哪，却吝啬流汗，那资产阶级法权的绊马索，不正是——新的锁链！

2、连篇累牍的反动评论

在“四人帮”及其余党的反革命叫嚣声中，《朝霞》连篇累牍地炮制诗歌、小说、散文、杂文，为张春桥、姚文元的反动文章和反动观点作图解，不仅如此，“四人帮”的反革命急先锋——原上海市委写作组，还不断地改头换面，在《朝霞》上抛出了一篇

又一篇反动评论，打着学习马列的旗号，为“四人帮”借“法权问题”另搞一套大造反革命舆论。这是在1975年短短的几期《朝霞》中，原市委写作组抛出的有关文章的篇目：

《作家·创作·世界观》

——从高尔基的《母亲》和《忏悔》及列宁的批评想起的

《走出“彼得堡”！》

——谈列宁一九一九年七月致高尔基的信有感

《让思想冲破牢笼》

——学习列宁《欧仁·鲍狄埃》有感

《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与改造文艺队伍》

《为新生事物大喊大叫》

——学习马克思、恩格斯一八五五年致拉萨尔的信有感

3、《序曲》的黑姐妹：《无产者》

1976年，为了配合“四人帮”篡党夺权，陈冀德布置将《朝霞》上有关“法权问题”的作品选编成集，妄图搞成又一个《序曲》式的“集束手榴弹”，向我们党猖狂进攻。这本集子定名《无产者》，只是由于“四人帮”的彻底垮台，它才没来得及出笼。下面是任大霖同志1977年11月17日的揭发。

1976年3月间，陈冀德向《朝霞》编辑室布置一个任务：出版《朝霞丛书》之二《无产者》。陈冀德在一次编委会上具体规定：这本书选编《朝霞》月刊、丛刊上发表过的“批判资产阶级法权”内容的作品，封面上要加一条副标题：“批判资产阶级法权作品选”。书的规格与《序曲》一样。主要选1975年的作品，与《序曲》一样，所有选上的作品都不作修改，由原市委写作组写序言。

编委会研究后决定由一位编辑同志初步拟出选目，送陈冀德审阅，后又由另一位编辑根据选目作了剪贴，发稿后又把校样送给陈冀德。6月份陈冀德交下一篇《快把那炉火燃得通红——〈无产者〉序》，在《朝霞》7月号上发表。这是一篇毒汁四溅的黑文，这篇黑文暴露了“四人帮”编选《无产者》的险恶用心，它说：“这些作品本身可以说也就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添了一把火！”“我们的作品不仅要反映对老资产阶级的斗争，更要敏锐地反映对新资产阶级的斗争，尤其是反映对党内走资派的斗争，因为正是他们手中窃取了相当大的一部分权力，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比资本家还厉害，理所当然地成为无产阶级进攻的重点。这本集子中的作品充分注意到这种阶级关系的变动，突出反映了对走资派的斗争，值得提倡。”

《无产者》还未付印，“四人帮”被粉碎了，这株和《序曲》一样的大毒草才没能出笼。

（七）“四人帮”及其余党利用文艺形式，无耻地吹捧他们自己，为他们的“登基上台”，大造反革命舆论

1、为特务分子张春桥树碑立传

甲、欧阳文彬同志1977年11月18日的揭发

在“四人帮”猖狂一跳，行将复灭的日子里，“四人帮”余党肖木、朱永嘉、陈冀德加紧策划修改毒草话剧《盛大的节日》，为张春桥一伙树碑立传。

一九七六年七月初，陈冀德打电话来，传达“四人帮”余党徐景贤的旨意，要《朝霞》丛刊发表《盛大的节日》话剧剧本，并且指定要发修改本。这时这出话剧已经上演了两个月，张家龙改编的电影文学本也已完成。话剧本的作者王公序、刘世正正在外地根据张家龙提的意见修改本子。我们和文化局创评组联系，拿到他们的改本，送陈冀德审阅。七月十日，陈冀德到《朝霞》，找两位作者谈修改意见。作者先汇报了按张家龙意见修改的情况，然后听陈冀德谈。

陈冀德说：“有关同志意见，井峰这个人物要加强，要通过李大生反映造反派内部的思想斗争。”又说：“朱永嘉也看了本子，谈了些意见，主要是加强井峰。”可见这个“有关同志”不是朱永嘉，而是比朱永嘉更高的人物。陈冀德这样故作神秘，无非是表示她谈的意见“有来头”，借以压人。

陈冀德谈具体修改意见时也强调“主要精神还是上述的两个方面”，她谈的很详细，逐场逐场地谈，就连厂长石陆家墙上挂的一幅画都提了意见要换掉。主要内容是：

（一）“加强井峰”。因为作者表示戏的路子已经定了，主角是铁根，对这条意见感到不好办。陈冀德出点子说：“在可有可无的时候不要让井峰出场，井峰出场一定要给人以强烈的印象，要有利于加强井峰的形象。”陈冀德还提了加强井峰的具体方法，如：“让井峰体现党的领导”，“使井峰高于铁根”，“让井峰做李大生的工作”，“让井峰和走资派斗”等等，总之是千方百计“让井峰发挥作用”。陈冀德还说：“实际生活中，干部出来比较迟，我们要提炼概括得更典型，塑造体现党的领导的革命干部形象。”

（二）“通过李大生反映造反派的思想斗争”。陈冀德强调要把李大生推远一点，让井峰提出“应当防止造反派内部分裂”，指出“李大生可能分裂出去的迹象”，并“让井峰做李大生的工作”，“避免了两派对立和武斗”，“促成了联合夺权”，“使戏的思想深度加强”。

联系陈冀德一九七六年多次宣扬的：“工总司本来要分裂，是张春桥做了许多工作，才避免了分裂，才有一月革命和上海的大好形势。”陈冀德插手《盛大的节日》修改时所提的意见，用意是很明显的。

最后，陈冀德还声称：“小意见可改可不改，两条主要的意见非改不可。”她就是

这样强令作者按照“四人帮”的需要修改剧本，为张春桥树碑立传。

乙、陈冀德关于《盛大的节日》的交代（节录）

七六年五月，朱永嘉去看了这个戏，看上了，决定要抓这个戏。当时他提出了修改意见，最主要的，认为党的领导的形象写得不行，他要求把作品主角改成党的领导干部的形象。……我思想上有一个想法，感到文化大革命初期在党委书记的领导下造反，在实际生活中几乎没有，这样写了是否符合历史真实。当时党的各级组织实际上都给造反派冲瘫痪了。朱永嘉却说，文化大革命是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主席不就是党的领导干部的形象吗？还说，什么叫历史真实？上海的文化大革命没有张、姚会搞成个什么样子？你们连生活真实都没有反映出来，还讲什么历史真实，我反对改变这个剧本的主角，不是反对吹捧张、姚的形象，而是感到从艺术上来讲，这样的意见是不对的，作者没有办法作这样的修改。……有一次在谈到这个剧本的时候，我又把这些想法提出来了，并与朱永嘉争论起来，当时肖木也在场，他说，你们别争了，你们讲的都不是艺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当时为什么是政治问题的说法没有仔细去想，因为在这个戏中要加强党的领导的形象，这点我与朱其实没有矛盾，对朱永嘉说上海的文化大革命没有张、姚会搞成什么样子的说法，我是完全同意的。

2、为叛徒江青唱“赞美诗”

1976年初，正当总理逝世，“四人帮”反动气焰十分嚣张的时候，陈冀德与肖木合谋，在《朝霞》上抛出了大肆吹捧江青的反动随笔《报春花礼赞》，为江青“登基”大造反革命舆论。

3、为阶级异己分子姚文元歌功颂德

1976年5月，在《朝霞》上又抛出了一篇为反党野心家姚文元及姚的《评〈海瑞罢官〉》树碑立传的“马屁文学”作品《五月惊雷》。下面是朱敏慎同志1977年11月18日的揭发（节录）

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九日，陈冀德来编辑室讨论五月号文化大革命征文专辑的选题。会上陈冀德说：“林正义在二月份写好一篇反映大学文化革命的小说《五月惊雷》，稿子前面几段可以了，最后一段上不去，要他改一改，放在五月号发。”

四月二十日左右，林正义把稿件送来，编辑室看后即送审。随后，写作组王绍玺找作者谈意见，……作者根据这些意见修改后，在四月二十七日又送审。校样排出后，王绍玺说：“已送肖木看过，并要让它带头。”

今天看，这一小说是直接配合“四人帮”刮起的所谓反击教育界右倾翻案风，全盘否定建国以后十七年教育战线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主导地位。同时，陈冀德要把这一小说留在五月号发，也是为“四人帮”歌功颂德，文中直接提到《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公开为姚树碑立传，完全是一种阴谋文艺。

